
美國大學需要變成少林寺嗎？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

大學生只具初中數學水平

筆者在一間大學的數學系任教，前一陣子與同事共進午餐時間聊，她慨嘆地指出：現在她教導的一個班，內容的水平只是八年級，亦即是初中程度，很多學生根本未有足夠基礎上大學課程，所以現在她要為他們「惡補」或者「補鑊」。

讀者可能會問：「這是不是你大學獨有的問題？其他美國大學不會那麼糟糕吧？」其實，即使最頂尖的大學亦面對着同樣問題。最近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數學教授斯坦科娃（Zvezdelina Stankova）在《舊金山標準報》（San Francisco Standard）撰文指出，越來越多學生根本不具備大學理工科所需要的基礎數學知識，有些學生只具有初中程度，有些的數學水平落後了五至八年，結果本來應該教導微積分的課堂，變成了初中分數和代數的補習班。

2020年，加州大學決定逐步停止在本科收生中使用 SAT 和 ACT；柏克萊由2021年秋季招生週期起不再將兩項考試成績納入取錄考量。斯坦科娃認為，加州大學取消 SAT 和 ACT 作為共同學術基準，是學生數學準備程度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。她引用柏克萊微積

分課程的診斷數據指出，2018至2020年間約71%的受測學生已具備或接近具備修讀微積分所需的數學基礎；到了2021至2023年，這一比例降至約51%，2023年更降至44%。今年春夏之間，反對現行政策的聲音迅速擴大；截至七月底，已有超過三千名加州大學教師聯署支持重新考慮標準化入學測試。

帕克來並不是個別例子，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（UC San Diego）2026年秋季學期的補救數學課程「MATH 2」兩門班級全部額滿，並有175名學生在候補名單上，該大學約有365名大一新生需要修讀這門僅涵蓋高中基礎程度的數學課。該課程屬於預備性質，不計入畢業所需的學分，卻需耗費每位州內學生約1,762美元的學費，若因進度落後而延畢，還會大幅增加學雜費與生活住宿成本。數據顯示，近年該校落入補救數學的新生比例已從2016年的約1%激增至近12%。

無怪乎包括哈佛、耶魯、達特茅斯等常春藤盟校及多所頂尖大學近期已宣布恢復 SAT 和 ACT 作為入學條件。在筆者看來，這是撥亂反正的重要一步，但問題是：那些已經被大學取錄但水平不達標的學生又要怎樣處理呢？有人可能會說：一方面盡量為他們惡補，另一方面將不達標的學生淘汰。

兩個矛盾的目標：維持學術水準與防止學生流失

可是，第二個方法很難執行，在面對學生程度低落的同時，美國大學還面對着另一個棘手的難題：偏低的學生留存率（Retention rate）和畢業率（Graduation rate），留存率的定義通常是指首次入學的本科生，到下一個秋季仍然在同一所大學就讀的比例，畢業率的定義是從學生第一年計起，有幾多百分比最終在四年或者六年內取得學位。在《美國新聞暨世界報告》這些高學評鑒和排名榜中，留存率是評估學生滿意度、學業支援系統及學校整體辦學成效的核心指標之一。根據美國教育部的統計數字，四年制大學首次入學的全日制本科生，第一年留存率約為八成；而首次、全日制攻讀學士學位的學生，大約64%至65%能在六年內完成學位。倘若這兩個數字偏低，那間大學便會很難看，故此提高這兩個數字都是很多大學的重要目標。

心水清的讀者會意識到：提高學生水平和提升留存率、畢業率這兩個目標存在着極大的張力。追求前者的過程中一定會篩去很多學生，就好像在少林寺要打出木人巷一樣；但重視後者的話，便不可能對學生太嚴苛，要配合學生去作出調整，否則教授便會受到非議。在筆者以前任教的一所大學裏面，系主任便曾經批評我責備學生，沒有「順應學生的處境」、沒有「將學生的學習視為己任」。

加劇社會衝突

在這種前提下，要將只具初中水平的大學生在幾年內脫胎換骨，真是難於登天。普遍學生除了程度偏低之外，更嚴重的問題是無心向學。我和同事都經歷過同樣的困難：許多學生要麼就是缺席，要麼就是在課堂上神遊。有些學生索性在堂上戴上耳筒，享受音樂或者觀賞電影，我曾經勸喻學生不要這樣浪費學習機會，有些學生便將耳筒移位，露出一邊耳朵，另一邊繼續被耳筒覆蓋。在另一所大學我曾經向校方高層反映過這問題，但回答是：「他們不上堂或者不聽書是病徵，根本原因可能是他們認為在堂上學不到知識。」換言之，他認為問題是在教授身上，而不是學生。

我對目前的趨勢感到很悲觀，我相信許多學生即使拿到了學位，即使成績單怎麼亮麗，這可能是「順應學生處境」的結果。但企業是講求業績、是冷酷無情的，在全球競爭下，企業絕不能容許自己在人工智能、半導體、雲端計算、航太科技、機械人、自駕車等各個領域滯後，那些不達標的畢業生可能找不到工作，或者在蒙混過關之後很快便被解僱。這樣，社會上的衝突將會越來越嚴重，那些畢業生覺得自己的學歷不被重視，便更加覺得自己受到歧視。

與此同時，美國科研和科技產業長期倚重海外人才。如果本土大學不能培養足夠具競爭力的畢業生，這種依賴自然更難降低。當一方面有本土畢業生認為學歷換不到預期的高薪厚職，另一方面企業仍需要大量吸納海外專業人才時，兩者之間的政治和社會張力也可能加劇，反移民情緒可能更加升溫。

好心做壞事

話又說回來，造成這局面的初心其實是善意的（追求多元化、平等、順應學生處境）。筆者在香港出生和長大，經歷過香港的填鴨式教育、地獄式考試、老師和同學的藐視，初來美國時，我真的感到耳目一新，美國的學習氛圍和制度，給予我第二次機會。

然而，任何善意的制度，久而久之都會出偏差，照顧弱勢社群、以學生為本、彈性安排、提供各種學習支援本來有其合理目的，但當這些措施逐漸變成「避免學生承受失敗的後果」時，那麼不但只學術水平暴跌，社會矛盾可能更趨向兩極化，最後變成了「好心做壞事」。問題不是大學應否幫助程度不足的學生，而是幫助的界線在哪裏。大學可以提供第二次機會，但第二次機會不應變成降低標準。也許，現在美國大學真的需要考慮採用「在少林寺打出木人巷」這教學模式。

2026年9月

原載於夏威夷版《號角》

[更多資訊](#)